

科学社会主义
活页参考资料

(3)

校内使用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校 内 用 书

*

197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1,000 册数：1,700

统一书号：3011·136

定 价：0.21元



蒲鲁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机会主义头子。从1846年起，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851年，蒲鲁东出版了《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对他的无政府主义谬论作了更充分的阐述。恩格斯在1851年8—10月间就认真阅读了蒲鲁东这一新著，并且作了精辟的批判分析，这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的教学与研究都有帮助。另外，我们把埃尔茨巴赫《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关于蒲鲁东学说的介绍作为附录，供参考。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 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	1
附录：蒲鲁东的学说·····	33

恩 格 斯

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关于革命的和工业的实践的习作选辑》1851年巴黎加尔涅兄弟公司版

(1) 告资产阶级。“你们一直是最勇敢、最能干的革命者。……”早在蛮族入侵之前，“你们就通过你们各城市的联盟，在高卢给罗马帝国盖上了第一层尸布”（第1页）。从那时以来直到如今，你们站在各次革命的首列。“凡是企图撇开你们、反对你们的事情都没有搞成；凡是你们着手进行的事情都没有出过错；凡是你们准备要做的事情都不会失败。”高谈阔论地讲到这个问题的历史发展。目前“老政治阴谋家”重新掌权并“把你们当作革命者”（第5页）。总之，接受这个称号，当革命者吧！

(2) 转入正题。接着是七篇习作，从三个方面谈到发展：（a）旧制度，（b）革命时期的政党，（c）解决办法，即本来意义上的革命（第1—2页）。

第一篇习作 反动派引起革命

任何革命都是无法阻止的。德罗兹设想，似乎一发生革命，就可以用让步和人为妥协的手段加以制止，布朗基认为，革命可以用{当局的}灵活手腕加以排除，他们的意见同样都是可笑的（第3—4页）。

法国君主制在从克洛维到黎塞留的时期内曾是革命的；1614年召开最后一次三级会议时，它成了反动的，报应就是1793年1月21日^①。“人们可以引导、节制、延缓一次革命”，这套办法——“一步步向它退让”——是“最聪明的”（第5页）。然而决不能强行遏止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尽管1822年和1839年的密谋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既定的利益和政府的傲慢”总是对抗革命的和平的发展和进程（第8页）。反动派总是引起革命。1789年和后来几年是这样，1848年也是这样。1848年2月，当“无产阶级介入资产阶级和国王的争论时，要求工作是它唯一的要求”。共和党人答应给工作，于是无产阶级就向他们靠拢（第10页）。“有劳动，靠劳动有面包，这就是1848年工人阶级的要求；这就是他们给共和国奠定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就是革命。”成立共和国是“少数人多少有点……篡权性质的行动”。“革命的劳动问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共和国仅仅是“革命的保证”（第11页）。

临时政府认真对待自己有关工作的诺言，但是它不能遵守诺言，因为要做到这点，它就必须“改变方针和调整社会的经

^① 这天路易十六被处决。——编者注

济”。然而它没有公开承认困难和诉诸政论家，而是保持沉默，马上成了反动的，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采用的新名称”——的敌人（第13页）。临时政府推动巴黎和卢昂饥饿的群众举行起义，并乘机把伟大的二月思想——工人抗议的思想——淹没在血泊之中。由此得出确定不移的结论，1848年的共和国和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共和国①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社会主义是1848年共和国的最后一言。

总之，在以前各种色彩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之间，现在进行着斗争。如果说我们起初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从1848年2月起反动派的行动在这方面就启发了我们——“正是由于反动派才发生革命的自决”（第17页）。

夸夸其谈地描述反动派和镇压怎样把民族的一大部分逐渐地革命化了，“秩序的永恒的朋友”资产阶级本身怎样遭到怀疑，受到限制，从而被抛进了革命的怀抱。接着一直叙述到新选举法②。于是，“当人民被弄到丧失了理智的时候”，剩下的唯一拯救办法就是暴力（第26页），而在1852年危机③面前采用暴力就意味着决心采取这样一套措施，其最后的一环只能是完全恢复封建的旧制度。但是这对我们说来是不可能的，而且你们也不敢这样做（第32页）。最后是号召共和党人做真正的革命者，“给革命造成保证，经济复兴的计划”（第33—35页）。

① 蒲鲁东原文是：“1793年的共和国”。——编者注

② 指立法议会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编者注

③ 当蒲鲁东写这本书的时候，由于路易·波拿巴总统任期将在1852年4月届满，法国将发生一场政治危机。——编者注

第二篇习作 十九世纪的革命 有充分的理由吗？

1. 社会趋势的规律。1789年革命不过完成了一半工作

“革命的动因与其说是社会在一定的时刻感到不安，不如说是这种不安的持续性，它导致安宁的消失和失效”（第36页）。所以，革命的原因是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趋势。人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人民并不要求完善的社会制度；但是人民希望，“存在导致幸福和德行的趋势”，而“当他们面前存在导致贫困和腐化的趋势时”，他们就举行起义（第37页）。

总之，目前是什么趋势在社会中起作用呢？

1789年仅仅推翻了旧政权，但是根本没有建设什么。因此才有“那种六十年来一直折磨着法国社会的无法忍受的生活方式”（总之，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中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自由竞争只有否定的意义，因而真正的资产阶级制度还应该成为寻求的目标）。

还没有建立“民族的经济和利益的平衡”，以取代1789年8月4日被消灭了的封建组织。“既然在公民们的地位方面不再考虑出身，既然只有劳动才是一切（?!），财产取决于劳动；……显然革命的问题在于……到处……建立平等的或工业的制度”（第39页）（仿佛这一点没有在可能的程度内实行过！）。

但是人们不了解这一点，而完全服从于政治。“经济见解的缺乏，统治的观念①，对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一切把革命者推上了错误的道路（第40页）。政治在一切有才能的人

身上“超越工业；卢梭和孟德斯鸠排斥魁奈和亚当·斯密”（111）。因此新社会总是停留在萌芽状态（第41页）。

2. 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社会走向贫困的趋势

“我把一定的行动原则称为经济力量，这就是分工、竞争、集体力量、交换、信贷、所有权，这些东西之于劳动和财富，正如阶级差别、代议制、世袭君主制、行政管理的集中之于国家一样（对比得不坏呀！）。如果这些力量保持均衡，服从它们所固有的而决不是依赖于人的任性的规律的话，那么劳动就会是有组织的，普遍的幸福就会是有保证的。相反地，如果这些力量缺乏引导，没有平衡（反对什么？②），劳动就会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经济力量的有益效果就会和有害效果等量混杂；亏空就会抵销收益；社会作为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中心、代办或主体，就会处于一种灾难日益深重的状况。”（第42、43页）

迄今为止只有过两种社会存在的形式：“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而且这两种形式又互不相容和根本矛盾”。

“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这些力量反对统治的制度这个妨碍它们组织起来的唯一障碍的斗争，……这就是折磨着法国社会的不安的真正的、深刻的原因”。（这样，蒲鲁东这个道地的法国人就把法国的官僚统治和资产阶级既统治自己、又统

① 蒲鲁东原文是，“统治的偏见”。在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中，“统治”一词通常用来表示政体、国家体制的原则以及一切权力的原则。
——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蒲鲁东用的是Contre-poids（平衡）一词。恩格斯用的是Contre quoi?（反对什么？）这一词组。这两者前半部分相同，后面的音节压韵。——编者注

治无产阶级时的正常状况混为一谈。) (第43页)

举例: (1) 分工。{被描绘为}现代工业的基本原则, 同时又是工人们备受折磨和工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例如, 在英国, 由于分工和采用机器的结果, 同一个企业的工人人数减少到原有人数的 $1/2$, $1/3$ 甚至 $1/6$, “接着工资按同样的比例下降, 平均从每天 3 法郎降到 50 生丁和 30 生丁” (11) (第46页)。如果不考虑这些绝妙的资料的话 (第46页), 一切都是非常平淡寻常的。

(2) 竞争。“竞争是市场的规律, 是交换的作料, 是劳动的咸盐” (妙极了!)。“但是竞争由于缺少合法的 (1) 形式, 缺少最高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理智, 本身又被歪曲了”。工人们推脱参加竞争, 除非是本身之间为了降低工资的竞争。竞争变成了垄断, 而且造成了新贵族。非常平淡。

“不久以前, 当警察局长应合一般人的愿望 (对卡尔利埃说恭维话), 许可拍卖肉类时, 人们已经看到了, 自由竞争能给人民的福利做些什么, 而这种保证①在我们当中又是多么地迷人。” (第48页) 啊, 癞蛤蟆! 卡尔利埃先生的资产阶级的措施 {竟被描绘} 成了社会主义的措施! 自由贸易所以是社会主义的, 仅仅因为在法国并不存在自由贸易!

其次讲到信贷。法兰西银行的垄断。按照蒲鲁东的说法, 这种垄断的罪过在于, “财产日积月累抵押了120亿, 而国家抵押了60多亿”, 利息以及和这种债务有关的其他费用达到了一年12亿 (仍然等于 $6\frac{2}{3}\%$), 此外, 7 亿至 8 亿属于每年以延期付款、公司股票、股息、无担保证券、诉讼赔偿费等等形

① 蒲鲁东在前面几行说, “竞争应当是私人贸易的保证”。——编者注

式给预付资金交纳的贴现；垄断的罪过在于，由于这一切，房租和地租猛涨，全年产值100亿中有60亿被寄生虫吞没了（第51—52页）。接着举例或引证材料以证明，人民的状况日益困苦，人民的收入按照和马尔萨斯提出的级数相对的算术级数不断减少，这就是（按生丁计算，见第52页）：

65, 60, 55, ……15, 10, 5, 0, -5, -10, -15。

由此可见，似乎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那时工人不仅不会由于自己一天的劳动得到一定数量的生丁，而且自己还应该为一天的劳动付出5个、10个、15个生丁！而工资规律怎么办呢！而竞争呢！

列举出来说明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的事例如下：酒类、肉类等等的消费量减少；招兵时降低身高方面的要求，服兵役不合格的人数增加：1830年至1839年为45¹/₂%，1839年至1848年为50¹/₂%；普遍教育和社会目前的状况不相称；犯罪率增长：

1827年 34908起刑事案件，47443名被告。

1846年 80891起刑事案件，101433名被告。

1847年 95914起刑事案件，121159名被告。

在感化院中：

1829年 108390起案件，159740名被告。

1845年 152923起案件，197913名被告。

1847年 184922起案件，239291名被告。

3. 统治的不正常状态，走向暴政和腐化的趋势

1848年以前，工人们还受到过慈善机关甚至政府的关心。1848年以来，前进了一步：人们认识到了，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在这里达到某种转变，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国家债务的利息1814年是6300万，现在是2亿7100万。1802年预算为5亿8900万，1848年预算为16亿9200万；预算的增加不

能以政府的愚蠢和居心不良来解释。从1830年到1848年，发给官员们的薪俸总额增加了6500万。原因是同样的。（法国有568 365名官员，蒲鲁东由此计算出来，每十人里面有一人靠预算生活，就是说，原来法国只有5 115 285个男子，而1848年参加选举的有650多万！）（见第62页）官员们人数的这种增加和军事预算的增长，证明加强强制和暴力手段的需要日益增长，从而也说明无产阶级对于国家的危险日益增加。国家维持大地产和资本的趋势直接导致腐化，这是任何集中的直接后果。总之：“十九世纪存在发生革命的充分理由”。

顺便说说，在这第二篇习作中也见到如下的奇文：

（1）“现行的税收制度……是这样设想的，要生产者缴纳一切，资本家却什么也不缴纳。事实上，即使当后者因为无论哪笔款项而被列入税收册时，或者当他清偿国库对消费品规定的税款时，显然他从尝到他的资本的甜头中，而不是从产品交换中得来的收入也是免税的，因为只有生产的人才纳税。”

（第65页）在后面这个“因为”中，包含着在头一句话里面作为应该加以证明的东西而提出的同一个论点，这样一来，这个论点自然而然就成为已经证明了的。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坚不可摧的逻辑。这个论点他继续加以发挥：“所以，在资本和当局之间有一个唯一勒索劳动者的契约；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契约的秘密仅仅在于对产品收税，而不是给资本规定税款。在这种借口下，资本家一所有者装作和其他公民一样为自己的地皮、房屋、动产、变动、旅行、消费等等纳税。因此，他说，他的收入在纳税前是3000、6000、10 000或20 000法郎，纳税后不过是2 500、4 500、8 000或15 000法郎。而且针对这种情况他比他的房客更加愤愤不平地大声反对预算膨胀。纯粹是遁辞。资本家什么也没有缴纳；政府和他分得了，仅此而已”

（政府从生产者手中夺去一部分产品，这也是和生产者分得，照这样说来，甚至可以断言，资本家也和直接生产者分得了）。政府和资本家进行共同的事业（啊，施蒂纳！）。所以，由于收入2 000法郎的租金，条件不过是拿出四分之一来清偿，因而账上留名，有哪一个工人不会引以为荣呢？”（11）（第65、66页）

（2）土地登记是这样进行的，“似乎立法者的目标是要仿效封建的权利重新规定不动产不得转让！似乎立法者想要不断地提醒8月4日夜间接获得解放的农民，他曾经处于奴隶状况；土地并不曾属于他所有；除非君主特许，任何耕者理所当然地都是永久的佃户和永远管业的！”（第66页）啊，施蒂纳！似乎大地产不是和小地产一样以同样的理由登记入册，因而由此得出结论——路易-菲力浦也曾是永远管业的！

（3）论证自由贸易和说明保护关税政策。税款给国家提供1亿6 000万。假定取消了关税，外国在法国市场上的竞争加强了。“假定那时国家向法国工业家们提出如下的建议：要未缴给我1亿6 000万，以便保护你们的利益，要未留着这笔钱，你们宁愿怎样呢？你们想工业家们会选择前者吗？这恰好是政府强加于他们的。在我们花在外国的产品上和我们把产品提供给外国的通常费用以外，国家又加上了1亿6 000万，这笔钱它作为小费给自己享用了：请看什么是关税。”（第68、69页）即使这类的荒唐事还可以用法国的轻率的税率来加以辩解，蒲鲁东先生也仍然讲过了头，他竟然拿法国式样的尺子来衡量保护关税政策并且把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冒充为向资本家征税。

（4）蒲鲁东在第73页和第74页上引证了鲁瓦埃-科拉尔的演说（1822年1月19—24日众议院的辩论），这个法学家在

演说中惋惜（议会的）独立的官职及其他“民主的体制”——这些“私人权利的强壮的筋膜，君主制内部的真正的共和国”——消失不见了。这些体制据说在一切方面都能够成为最高权力的障碍，而政府权力虽然分立了，现在它在自己的行动中却丝毫不受限制。这位旧式的法学家无法掩饰自己对官僚制度的憎恨，蒲鲁东先生却把他的反动的回忆错当作社会革命的观点了。“鲁瓦埃-科拉尔先生关于1814年君主制所说的话，对1848年共和国说来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正确的。”鲁瓦埃-科拉尔一句乱无头绪的话把蒲鲁东先生引入了迷途：“所以，宪章①应该既给政府、又给社会提供体制。社会一定没有被忘记，也没有被忽视，但是被摆到次位了。……”从鲁瓦埃-科拉尔下面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出，他说社会指的是什么：“宪章只有把出版自由定为公共的权利，才会使社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第75页）。可见，社会就是从有权对抗政府的观点来看待的国民。

第三篇 习作 联合的原则

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不妨评价一下提供人民作为食粮的理论，所有的革命必须承受的负担”（第79页）。我们只要批判这些理论的共同的原则，就能把他们一下子全都了结：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卡贝、路易·勃朗等。所有这些体系的这种原则是联合。

联合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的平衡”，联合甚至根本不是

① 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路易十八于1814年6月4日“赐给的”所谓宪章。——编者注

一种“力量”，联合是一种“信条”（第84页）。彻底发挥联合的原则，必然导致一种体系，而建立在这种体系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一定会成为宗教（第84页）。

联合并不是经济力量，贸易才是经济力量，因为“贸易尽管由于物质上的事实而给运输提供服务，就其本身来说对于消费的一种直接的刺激，因而是一个生产的原因，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原则（！）。……交换的形而上学的行为，和劳动一样是现实和财富的生产者，不过是以和劳动不同的方式罢了。……所以，由于从事摆脱了一切证券投机（！！）的真正的投机而致富的商人，享受他获得的运气是公平合理的；这种运气和劳动产生的运气是同样合法的”（这个资产者在这里忘记了，我如果不拥有资本，无论如何也做不了生意，而只好去为别人、为资本家随便劳动多少；一般说来这种商人的辩护词是非常出色的）。接着说，“交换，这种纯道德的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活动”（第85页）。

属于经济力量之列的，还有集体力量，——正如蒲鲁东所夸耀的，他早在他的《什么是财产？》中就发现了集体力量，——同样还有竞争、分工、所有权等等。

蒲鲁东称为“经济力量”的东西，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的形式，这些形式表现为对作为小业主的他有用的形态，在他的心目中或者只有好的方面，或者即使还有坏的方面，至少也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好的方面。甚至最一般的生产和流通形式，一旦被发现，然后到处都由下面每一代人以相应改变的形态加以采用，这些形式属于社会的这样一些自力获得的财产之列，如水力的利用，关于地球具有球形的知识，把地球表面划分为经度和纬度的能力等等，——甚至这些形式，蒲鲁东也仅仅是按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形态予以接受的。

例如，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交换在他那里立刻溶化在贸易之中了。至少是，即使集体力量的概念看来象是某种永恒的东西，这个概念也并不会因此而不再意味着无非是企图把社会的存在本身变为经济力量。没有社会，正如没有集体力量一样，就不会有人的关系，也就不会有流通。交换、分工、竞争、信贷都是集体力量的表现。发生任何关系的至少是两个人，凡是两个人共同努力做某件事，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的地方，那里就有集体力量。然而，当人们起初向我们把社会成员参加生产和流通的一切形式描绘为力量，最后又企图把社会的存在本身，既把社会生产，又把社会流通作为特殊的经济力量强加于我们时，那是可笑的。但是，蒲鲁东喋喋不休地谈论的那种原始的、粗糙的集体力量形式（修建金字塔、方尖碑等等时的大规模劳动），早已被马匹、机器、分工排挤掉了，被完全不同的形式代替了。

但是，如果贸易、竞争、分工等等是经济力量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譬如工厂制度、银行制度、货币、地产析分、大地产、雇佣劳动、资本和利息也看作是经济力量。用所列举的这些“力量”的每一种，都不难编出蒲鲁东用来赞扬前面那些经济力量的格式的颂辞。可是全部障碍也就在这里。

滑稽的是，蒲鲁东在第88页上把这种力量的对比称为“实质上非物质的”，并且以它们似乎具有非物质的性质为依据，唱起了自己的赞美曲，例如说什么经济学家用工业力量的理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基督教理论的基本信条：从虚无中进行创造”（第87页），或者象前面那样{硬说}什么“纯道德的贸易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活动”（第86页）。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下列关于联合的长篇大论的诡辩：
“联合在本质上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是束缚工人

自由的一种锁链。对博爱的空想负责的作者们却……毫无道理地、毫无根据地把一种只属于集体力量、分工或交换的优点和效力归因于社会契约。……当一个工业公司或商业公司目标在于开动巨大的经济力量之一，或者在于开发大自然所要求的一种资源，以便这种资源保留为不可分割的，保留为一种垄断、一种联系的时候，为了这个目的成立的公司就能够获得良好的结果；但是这个公司创造出这种结果并不是由于它的原则，而是得亏它的手段。的确，每当能够不用联合而获得这种结果时，人们（不是，是资本家）就宁愿不参加联合。”（第88、89页）只有在需要的时候，人们才参加联合。

联合就意味着“讲团结，讲共同的责任，讲对于第三者权利和义务的融合”。“工薪的平等是联合的最高规律。”所以“对参加联合的弱者或懒汉说来，而且仅仅对他们说来，可以说联合是会产生好处的”。“粗笨无能的团结”（第89页）。每一个生意兴隆的社团“兴盛起来，是由于并非它固有的、同它的本质丝毫没有联系的某种客观原因”（第91页）。

同时，在现代所有的工人社团中，工均的工资由计时制度代替了——在联合力量和资本时尽可能少一点团结，尽可能多一点独立性，也就是说，尽可能少联合一点，尽可能多增加一点手段。

“特别从家庭联系着眼和由于献身的规律，没有任何外在的经济上的考虑，没有任何占支配地位的利益而组成的联合，最后，为联合而实行的联合，是一种纯宗教的行为，是一种没有实在价值的超自然的联系，是一种神话。”

至于巴黎工人的社团，蒲鲁东则冷静地把它们分类如下：

“在这些社团当中，相当多的维持下去并且有希望继续发展；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一些社团是由该行业最熟练的工人